

人口世代更迭与经济增长速度： 兼析新常态下的人口政策选择

杨华磊¹, 周晓波², 王辉¹

(1.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当80后出生高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经济增速轨迹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剧烈下降的趋势。2016年左右,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为防止中国经济更快跌入人口悬崖,本文评价了延迟退休和放开生育政策制度,发现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0—2030年间,其一,延迟退休比不延迟退休好,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比放开生育政策好且调整退休制度的作用较大,之后则相反。其二,从迫切性和重要性来看,退休制度要先行;生育观念转变需要时日,生育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在长期上才能逐渐凸显,加上短期上对储蓄的替代,故生育政策重要但不急迫,而且选择何种生育政策需要谨慎。

关键词: 婴儿潮; 出生低谷; GDP 增速; 延迟退休; 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5)06-0097-10

Population Gener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Analysis on Population Policy Choices under the New Normal

YANG Hua-lei¹, ZHOU Xiao-bo², WANG Hui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generation of post-80s entered the labor market during 2003—2013, the China economic growth presented an inverted U type track. When the generations of post-90s and post-00s enter the labor market, growth will have dramatically declined. With post-90s and post-00s entering into the labor market, population bonus begins to disappear after 2016. To prevent Chinese economic fastly falling into demographic cliff, the paper evaluate the delay retirement and fertility policy, and we found that, when post-90s and post-00s are entering into the labor market, delaying retirement is better than not, maintaining fertility policy unchanged is better than a relaxed fertility policy, while adjusting the retirement system brings about great effect.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ies need to be performed immediately, fertility policy is important, but not urgent.

Key words: baby boom; baby bust; GDP growth; delayed retirement; fertility policy

收稿日期: 2015-10-08

作者简介: 杨华磊,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人口与经济研究;周晓波,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人口与经济研究;王辉,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

2000年左右,随着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负担逐年下降,中国储蓄率逐年上升,平均增速高达14.6%左右。2015年左右,随着60后婴儿潮逐步进入退休年龄,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经济进入新的低速常态。如果中国经济不能从依靠人口数量,转向依靠技术、资本、要素配置以及人口素质上,同时进行积极的产业升级,中国很有可能因为过重的社会负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口世代更替演进的过程影响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宏观经济的趋势性特征,面对此情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熟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世代,特别要了解最近90后和00后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0—2030年间对中国经济增速产生何种影响。明晰这种事实后,制定出适宜的前瞻性措施,辅助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有关人口世代的研究,如 Mankiw&Weil(1989)^[1]考察了人口世代更迭对住房市场的影响。杨华磊等(2015)^[2]对比了中日的人口世代,阐述了日本人口世代更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启示。陆旻和蔡昉(2014)^[3]研究了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李银珩和李硕(2006)^[4]阐述了美国1946—1964一代婴儿潮步入退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消费以及社会保障的影响。对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的考察可以参考 Andrew(2003)^[5]以及 Brooks(2002)^[6]的工作;婴儿潮进入老龄化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可以参考 Reinhardt(2000)^[7]的工作,人口世代更迭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上述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对中国婴儿潮和出生低谷界定的研究工作还是较少,更遗憾的是国内外经济学家从人口世代更替角度,分析中国80后、90后以及00后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经济增速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工作还是不充分的。

本文采用统计性描述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首先界定了中国的80后婴儿潮世代以及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世代。其次描述和模拟了80后、90后及00后交替进入劳动市场时对经济增速产生的影响。最后为了规避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降的趋势,为给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及提高人口素质赢得时间,为了缓解60后婴儿潮退休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在积累制的养老制度下,考察了放开生育和延迟退休两种人口政策对未来经济增速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历史上的婴儿潮和出生低谷

由于本文重点考察80后、90后以及00后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故不再陈述80后之前的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下文先陈述80后、90后和00后世代的特征,其次陈述这种特征转换对经济增速产生的影响。

(一)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世代

从图1看出,其一,在1979—1987年间,中国历年出生人数大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特征,从1979年的1738万剧烈增加到1987年的2550万左右;在1987—2003年间,出生人数大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87年的2550万剧烈下降到2003年的1604万左右;在2003—2012年间,出生人数在低水平1600万以上呈现轻微波动。其二,在1979—2012年间,中国存在一个1981—1993年的婴儿潮世代,峰部为1987年,因为大多为80后,近似简称为80后婴儿潮;1993年以后为出生低谷世代,由于多为90后和00后,近似简称为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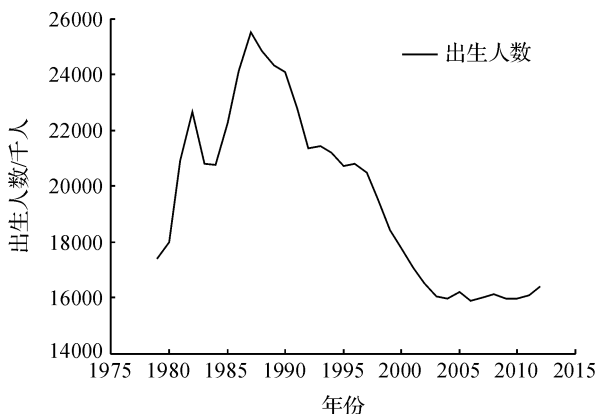


图1 1979—2012年间中国历年的出生人口数

资料来源:由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

(二) 人口世代下的人口结构和社会负担

考虑到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化,本文把19岁以前的人口称为青少年人口;根据当前中国退休年龄的特点,假设平均退休年龄为55岁,故20—54岁的人口为劳动人口,55岁以上的人口为老年人口。未来各个年龄阶段上人口结构数据,采用杨华磊等(2015)^[8]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 TFR = 1.5)下的预测,则未来青少年、劳动力以及老年人口数量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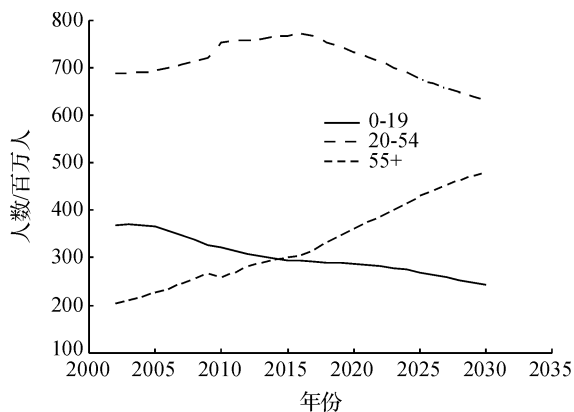


图2 2001—2030年间青少年、劳动人口以及老年人口数量

数据来源:杨华磊等(2015)估计的人口结构数据。

从图2可看出,在2001—2030年间,青少年人口数量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3.69亿下降到2030年的2.42亿;老年人口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2.02亿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劳动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峰部为2016年,从2002年的6.87亿增加到2016年的7.88亿,从2016年的7.88亿下降到2030年的6.31亿;同时老年人口在2015年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基本上,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

把青少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数量之和除以劳动人口数量定义为社会总抚养比。从图3可看出,2002—2010年间大体上社会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0.83下降到2010年的0.77;2010—2016年间社会抚养比稳定在0.77的低水平上;2016后社会抚养比呈现急剧上升,从2016年的0.77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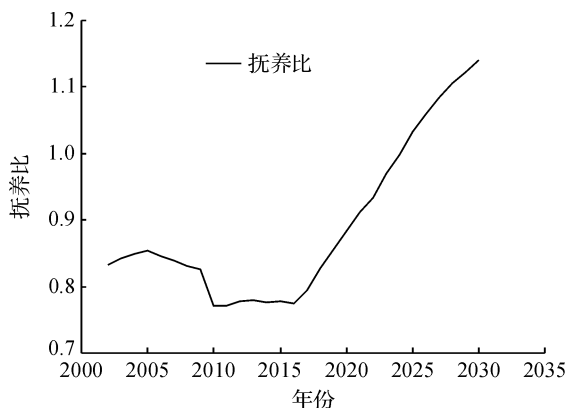


图3 2003—2030年间中国的总社会抚养比

数据来源:同图2。

到2030年的1.14左右,且2025年左右不劳动的青少年和老年人口数之和首次超过劳动人口数量。未来随着中国60后婴儿潮世代退休以及90后和00后生育低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引致老年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和劳动力人口急剧减少,最终社会抚养比呈现剧烈上升的趋势。

二、80后婴儿潮和中国过去经济增速

随着80后、90后以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即中国的婴儿潮和出生低谷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宏观经济会表现出何种形态呢?先考察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增速的影响。假设影响产出的资本、人力资本、要素使用效率以及劳动贡献份额不变,同时选择无量纲的经济增速指标,并且近似把20年前的出生率当做20年后劳动力的增速,这样假设的目的和合理性,其一,直观上获得人口世代更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其二,短期内要素使用效率和人口素质无法提升,产业升级又不可能在短期实现,资本存量惯性大以及短期内消费行为模式又较为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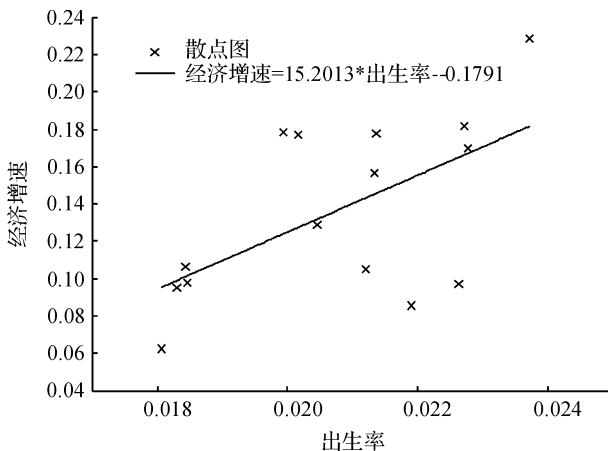


图4 1983—1993年间的出生率与2003—2013年间的经济增速的统计关系

资料来源:由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

从图4可看出,其一,20年前的出生率与20年后中国产出增速存在正相关性,20年前出生率较高的年份,对应年份的产出增速也就越高,如出生率最高的1987年为2.37%,则对应的2007年的产出增速也为最高。其二,20年前的出生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20年后的产出增速提高15.2个百分点。其三,如果正相关关系一直存在,20年后的产出增速也应一直下降;2003—2012年间出生率保持在1.2左右,则2023年后的经济增速也应比较稳定。总之,整体上80后、90后以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经济增速应该呈现一个先剧烈增加后剧烈减少,最后稳定的、类似20年前出生率特征的倒U型轨迹。为印证这种推断,我们给出1979—1993年间出生率数据和1999—2013年间的产出增速数据如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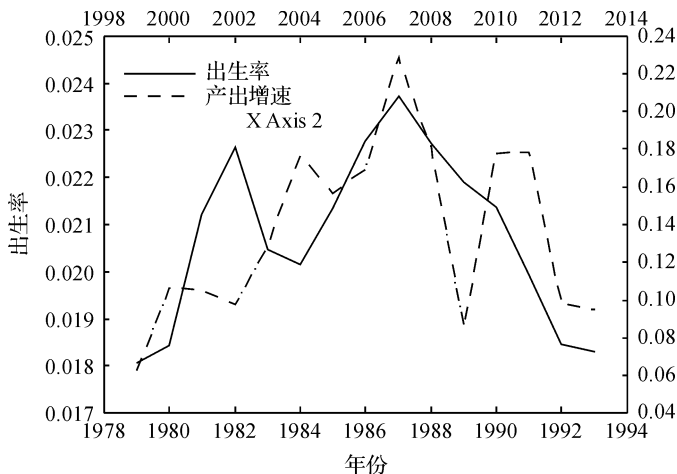


图5 1979—1993年间的出生率和1999—2013年间的产出增速

资料来源:同图4。

从图5可看出,1979—1993年间出生率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峰部为1987年,20年后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999—2013年间,中国经济增速也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峰部是2007年;1987年后出生率逐年下降,同样2007年之后剔除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大体上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在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0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在每年14.5%左右。9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未来10年,如果要素使用效率、资本贡献份额以及资本保持不变,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下降且基本上低于10%,直到202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

三、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与未来中国经济增速

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和家庭部门内生选择储蓄的情况下,在要素使用效率和资本贡献份额不变,不考虑人力资本以及折旧的情况下,采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模拟90后和00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0—203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

(一) 理论框架和参数设定

把任何一年人口分为青少年、劳动人口以及老年人口,青少年和老年人口不做出决策和不参与劳动。每期有劳动力人口决策,决策如何把当期的收入在当期消费、当期储蓄、抚养当代青少年支出、赡养当代老年人支出以及养老金支出之间分配,获得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的设定跟随Barro&Becker(1989)^[9]和杨华磊等(2015)^[10]的工作,效用关于消费的弹性为 σ ,且 $\sigma < 1$ 。折现系数为 β ,政府收取的养老金比例为 τ ,成年劳动力按照道德约束对一个老人赡养支付占工资的比例为 φ ,抚

养一个青少年的支出占工资的比例为 μ ;当期的消费、储蓄以及下一期的消费为 C_i^1 、 S_i 以及 C_i^2 ;当期青少年数量、成年人数量以及老年人口数量 H_i 、 L_i 和 O_i ;当期的工资水平、下一期的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分别为 w_i 、 w_{i+1} 以及 r_{i+1} ;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水平为 \bar{n} (可以通过准生权交易实现政策生育水平等于实际生育水平),同时采用具有向下回报机制的积累制养老制度阐述模型框架。

在积累制的养老下,每期成年劳动力的目标函数为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约束条件表现为,假设劳动人口在第 i 期的总劳动收入为 $L_i w_i$,这些收入在当期用于以下各项支出:消费为 C_i^1 ,储蓄为 S_i ,抚养子女的费用 $H_i \mu w_i$,抚养老人的费用 $\varphi w_i O_i$,缴纳养老金 $\tau L_i w_i$ 。 C_i^1 是当期收入在当期发生的消费;当期储蓄 S_i 在下一期将给其带来 $S_i(1+r_{i+1})$ 收入,当期养老金 $\tau L_i w_i$ 将在下一期给其带来 $\tau L_i w_i(1+r_{i+1})$ 单位收入,当期赡养老人的 $\varphi w_i O_i$ 费用和抚养费用 $H_i \mu w_i$ 将在下一期给其带来 $Q_{i+1} \varphi w_{i+1}$ 单位收入,故储蓄、养老金、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费用在下期产生效用流^①。最终每期劳动人口在每一期面临的规划是,如何选择当期的消费水平 C_i^1 和储蓄水平 S_i ,来实现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整理得:

$$\begin{aligned} \text{Max} U_i &= (C_i^1)^\sigma + \beta (C_i^2)^\sigma \\ \text{s. t.} \quad &\begin{cases} (1-\tau)L_i w_i = C_i^1 + S_i + H_i \mu w_i + Q_i \varphi w_i \\ C_i^2 = S_i(1+r_{i+1}) + \tau L_i w_i(1+r_{i+1}) + Q_{i+1} \varphi w_{i+1} \\ n_i = \bar{n} \\ 0 \leq \sigma, \beta, \gamma, \tau, \varphi, \mu_i \leq 1 \end{cases} \end{aligned} \quad (1)$$

不妨设生产函数为C-D形式,进一步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和资本贡献份额 α 不变,全要素生产率 A 是一个需要校准的量,则当期和下一期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begin{cases} Y_i = A(K_i)^\alpha(L_i)^{1-\alpha} \\ Y_{i+1} = A(K_{i+1})^\alpha(L_{i+1})^{1-\alpha} \end{cases} \quad (2)$$

在积累制养老制度下,政府收缴的养老金类似储蓄的功能,在不考虑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储蓄等于投资,同时假设养老金全部用于投资以及不存在闲置,则第 $i+1$ 期的资本量 K_{i+1} 等于第 i 期的资本 K_i 加上第 i 期的储蓄 S_i 和政府收缴的养老金 $\tau L_i w_i$,最终资本运动方程为:

$$K_{i+1} = K_i + S_i + \tau L_i w_i \quad (3)$$

如果把第 i 期看作基期,把每期的资本运动方程分别带入生产函数之中;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每期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每期资本的边际成本(利率),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工资),则有:

$$\begin{cases} w_i = A(1-\alpha)(K_i)^\alpha(L_i)^{-\alpha} \\ r_i = A\alpha(K_i)^{\alpha-1}(L_i)^{1-\alpha} \\ w_{i+1} = A(1-\alpha)(K_i + S_i + \tau L_i w_i)^\alpha(L_{i+1})^{-\alpha} \\ r_{i+1} = A\alpha(K_i + S_i + \tau L_i w_i)^{\alpha-1}(L_{i+1})^{1-\alpha} \end{cases} \quad (4)$$

上述除决策变量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外,其他变量和参数要么外生给定,要么由生产部门决定,要么由上一期和初始条件决定,要么通过初始校准获得。在不同的退休制度和生育政策下可以知道未来历年的人口结构,最终可以模拟在90后、00后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经济增速,同时可以在不同的生育政策和退休政策下,比较经济增速的差别,甄选退休制度和生育政策。各个参数和初值的

^①需要说明的是,从规划来看,每一期的劳动者收入分配方案至少满足从当期和下一期综合来看是最优的,下一期把上期存的钱取出,经过规划之后,再把本钱存起来,依次这样迭代下去,每过一年必须实行一次规划,每一次规划有每期的劳动人口做出,对上一期的资金结清来满足变化的人口结构。

取值如表1所示。

表1 各个参数和初值的取值

参数和初值	取值	设定依据
初始资本存量(亿元)	887958.72	参考古明明和张勇(2012) ^[11] 的工作
初始劳动力数量(人)	752692220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资本贡献份额	0.6	参考 Liao(2013) ^[12] 的工作
全要素生产率	0.030480126和0.029254746	校准获得
跨期替代弹性	0.95	参考杨子晖(2006) ^[13] 的工作
折现系数	0.9	参考黄宇(2010) ^[14] 的工作
抚养一个子女的费用占工资的比例	0.2	参照 Liao(2013) ^[12] ^[54] 的工作
抚养一个老年人占工资的比例	0.05	参照杨黎源(2013) ^[15] 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其一,不同的生育政策体现在不同的人口结构上,不同的退休政策影响的是劳动力数量和老年人数量。在此假设生育政策完全落实,即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水平就是实际生育水平,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威力完全释放。通过何种手段完全释放这股政策生育力量,让实际生育水平等于政策生育水平呢?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可以实现,让不符合条件的想生家庭,去置换符合条件但不想生的家庭,故假设政策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相同,在政策上是可以实现的;其二,下述研究结论和根据结论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在生育水平外生,不考虑人口迁移,不存在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劳动力短缺,适龄劳动力参与率100%,劳动力是同质的,要素报酬按照边际产出偿付,资本贡献份额不变,储蓄等于投资,养老金全部用于投资,资本不存在折旧,劳动和资本使用效率不变等假设下得出的。

(二) 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经济增速

预测值2是在资本内生化的情景下模拟的90后和00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经济增速;预测值1是根据1979—1993年间出生率与1999—2013年间经济增速间的统计关系预测的90后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经济增速;实际值是1999—2013年间的经济增速。

从图6可看出,无论是统计值,还是模拟值,在90后和00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段内,经济增速都将呈现下降的趋势。实际数据显示2011年以后的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且都低于10%;统计预测结果显示,由于90年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20年后产出增速也将出现剧烈下降,2013年左右经济增速首次跌破10%,到2023年时首次跌到1%左右;优化模型结果显示,9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1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速为8.5%左右且以后呈现下降的趋势,到2023年时为3%左右。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2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在一个低水位上轻微下降:统计预测显示,从2023年的1%左右跌到2031年的0.3%左右;优化模型显示,从2023年的3%下降到2031年的2.1%。相对优化模型统计预测的经济增速在2011—2023年间下降更剧烈,2023—2030年间较为平缓,内生优化模型整体下降平缓,但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

整体上,1999—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上升,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跌入人口悬崖,逐年下降,2023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在低水位上轻微下降。也即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段内,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节点是2007年;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段内,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一直剧烈下降的特征;00后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段内,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先剧烈下降,后在一个低水平上轻微下降的趋势,节点为2023年。

由于我国还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人均GDP才7000美元左右,如果未来中国不把经济增长

的动力从依靠劳动力数量转向依靠人口素质、技术、改革以及资本等要素中,延迟退休和吸纳优质移民补充现在的劳动力短缺,中国经济将是东亚地区跌入人口悬崖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为了给国家长期内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提高人口素质等赢得时间,相对维持生育政策和退休制度不变,基于经济增速的目标,评价延迟退休和放开生育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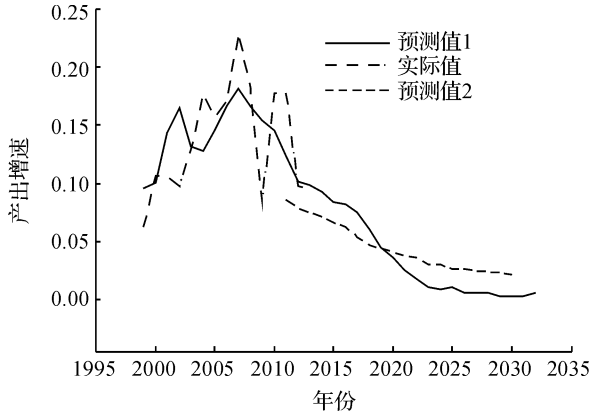


图6 1999—2030年间的中国经济增速

数据来源:原始数据通过2013年统计年鉴获得,其他数据通过统计推断和模拟获得。

(三) 不同退休和生育政策下的未来中国经济增速

在此主要考察两种生育政策,一种是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简称TFR1.5),一种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简称TFR2.0)。两种退休制度,其一,维持退休制度不变(简称RA55),平均退休年龄近似为55岁,青少年人口为0—19岁的人口,劳动力为20—5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54岁以上的人口;其二,延迟退休方案(简称RA60),平均退休年龄近似为60岁,青少人口依然是0—19岁的人口,劳动力为20—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59岁以上的人口,故不同退休制度不影响青少年人口数量,仅影响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采用上述理论模型,模拟不同退休制度和生育制度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基于经济增速最大化的目标,甄选合适的退休制度和生育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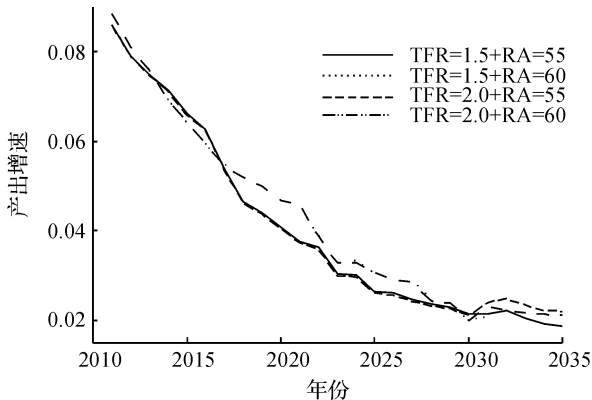


图7 不同退休制度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产出增速

资料来源:通过模拟获得。

从图7可看出,其一,无论是哪种退休制度和生育政策都无法改变2010年后经济增速剧烈下降的趋势,大体上从8.5%左右跌到2.0%左右,且各种情景下未来历年经济增速差别小于1%,源于中国已

经错过放开生育的最佳时机,80后出生高峰进入婚配的2000—2013年间(更确切的说是2007年之前,因为1987年为婴儿潮世代的峰部)。其二,2010—2017年间经济增速呈现一定程度的波动,放开生育政策下的经济增速轻微小于维持不变下的经济增速;延迟退休下的经济增速先稍高于不延迟退休下的经济增速,随后不延迟退休下的经济增速稍高于延迟退休下的经济增速。其三,2017—2030年间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且延迟退休情景下的产出增速最高,放开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产出增速次之,最低的是放开生育政策同时不延迟退休下的产出增速。其四,2030年之后放开生育政策下的经济增速开始大于维持不变下的经济增速,不延迟退休下的经济增速开始高于延迟退休下的经济增速。结合2017年前的波动特征,大体上延迟退休下的产出增速高于不延迟退休下的产出增速,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下的产出增速高于放开生育政策下的产出增速,且维持生育政策下的产出增速轻微高于放开生育政策下的产出增速,延迟退休下的产出增速远高于不延迟退休下的产出增速,故短期内,延迟退休更能够较大幅度的提升经济增速。

总之,在经济增速目标上,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段内,大体上,延迟退休好于不延迟退休,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好于放开生育政策,2030年之后,恰恰相反。在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0—2030年间,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龄人口的增多,放开生育政策在短期内会加重本来趋于减少且养老负担重的劳动力的抚养子女负担,引致储蓄减少,经济增速相对降低;未来,如2030年之后,随着生育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长期上却有利于降低劳动力负担,生产人口的增多,提高储蓄率,经济增速相对较高,故生育孩子更多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为,短期投入,回报至少20年之后才出现;同时延迟退休短期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减少了老年人口数量,降低养老负担,增加了储蓄,经济增速较大,但长期内,随着延迟退休制度的稳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作用就弱化了。在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0—2030年间,放开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无法改变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源于中国错过放开生育的最佳时机,延迟退休无法改变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最终基于产出增速最大化的目标,短期内,即在2030年之前,应该选择延迟退休和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制度组合,之后则应该相反。

四、结束语

研究发现,大体上中国的80后为婴儿潮世代,90后和00后为出生低谷世代。当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03—2013年间,历史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当90后和00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历史和模拟数据显示,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剧烈的下降趋势。为防止中国经济更快跌入人口悬崖,评价了延迟退休和放开生育政策制度后发现,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0—2030年间,大体上,延迟退休比不延迟退休好,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比放开生育政策好,且调整退休制度的效果较大,长期来看,结论则相反。从迫切性上看,因为当前马上要面临60后婴儿潮引致的退休潮,加上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经济系统面临巨大的冲击,退休制度要先行,这急迫且重要;因为生育观念转变需要时日,生育小孩是长期投资行为,长期内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才逐渐凸显,加上短期抚养子女对储蓄的替代作用,会加重社会负担,故生育政策重要但不急迫,选择何种生育政策需要谨慎。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考虑到未来人口结构问题突出,老龄化以及性别比失衡;同时考虑代际代间生育权的平等,中国人口基数依然很大,人口、资源以及环境的矛盾突出,加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城镇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储蓄水平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弱,目前可以考虑二胎软着陆的生育政策,实行有条件二胎的过渡生育政策,如鼓励城镇居民生育政策,同时为保障有条件二胎政策目标的实现,国家可以尝试配套推出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制度。其二,对于退休制度,考虑到由于过去采取产业发展、城乡发展以及区域发展战略引致的中国部门、城乡以及区域的

工资、津贴以及养老待遇不同,加上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也是结构性的短缺,如技术工人短缺,机关和事业单位劳动力过剩,由于延迟退休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最终造成不同的既得利益个体对待退休的态度不同,所以中国的延迟退休需要结合这种差异性,不能一刀切,实行结构性延迟退休策略。

同时为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除改变生育和退休制度外,还可以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如把子女养育父母的现收现付制改成自己养育自己的积累制养老制度,鼓励家庭储蓄养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推迟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降低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养老金的替代率,提高企业个人养老金的替代率,推进全国养老金统筹,完善农村养老体制,加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做实养老金个人账户。为避免养老金的缩水,可以选取合适的产品和合适的投放比例,对养老金进行投资,同时为避免养老金腐败和保障养老金安全,加强对养老金使用的监管。在要素配置层面,提高要素参与率和促进要素流动,延长要素红利和释放配置效率:降低失业率,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发展技术和职业教育;打破传统金融机构僵硬的体制,降低入市的门槛,发展场外交易系统,培养新型金融机构,如银子银行,服务现代中小企业;促进要素市场流动,继续推行城镇化战略,统一户籍制度,改变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利率的市场化,使得金融真正为广大有效率的企业服务。

最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红利也将慢慢消失,如今在保持和维持原有产业的基础上,为国家的长期发展,要积极培养新兴产业,扶持战略产业,打造支柱产业,并且积极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最终形成生态农业为基础,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为辅助的产业结构,真正使得产业结构适应未来新型的人口世代,即少但素质高的人口世代。

参考文献:

- [1] MANKIW N G, WEIL D N. Baby boom, Baby Bust and the Housing Market[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89, 19(2): 235-258.
- [2] 杨华磊. 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及其启示[J]. *社会科学研究*, 2015(5): 66-72.
- [3] 陆旸, 蔡昉. 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 *世界经济*, 2014(1): 3-29.
- [4] 李银珩, 李硕. 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06(2): 41-45.
- [5] ANDREW B A. The Effects of a Baby Boom on Stock Price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Social Secur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2): 551-578.
- [6] BROOKS R. 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2002, 2: 402-406.
- [7] REINHARDT U E. Health Care for the Aging Baby Boom: Lessons from Abroad[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2): 71-83.
- [8] 杨华磊. 生育政策、人口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J]. *制度经济研究*, 2015(2): 37-62.
- [9] BARROJ, BECKER S.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J]. *Econometrica*, 1989, 57(2): 481-501.
- [10] 杨华磊. 退休方案和养老制度对产出和福利的影响: 兼析养老和退休制度的甄选[J]. *保险研究*, 2015(5): 106-120.
- [11] 古明明, 张勇. 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和分解[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12): 29-41.
- [12] LIAO P J. The One-child Policy: A Macroeconomic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3): 49-62.
- [13] 杨子晖.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 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J]. *世界经济*, 2006(6): 37-46.
- [14] 黄宇. 我国城镇居民跨期消费行为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10(3): 45-52.
- [15] 杨黎源. 老龄化成本的国际比较与中国应对策略: 基于养老支出视角的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3): 92-100.